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的轉型

——兼答林培瑞、杜邁可、張隆溪教授

• 劉 康

大陸文學研究的學術自覺

在西方(主要是在美國)，經過了幾十年的周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終於逐漸擺脫了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婢女的地位和古典文學研究的「漢學正宗」的陰影，步入了學術殿堂。包括了60年代由港台去美國的華裔學者在內的漢學家們，筭路藍縷，摸索出了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途徑，寫出了一批有影響的學術論著。美國名牌大學的中文系和東亞系以及部分比較文學系，現在都招聘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者。以現代文學為課題的博士論文，近年更大大超過了傳統漢學的古典文學題目。80年代末，一批來自中國大陸，主要是攻讀比較文學的青年學者，在美國學術界開始展露頭角，對西方的中國現代文學和其他漢學領域產生衝擊和影響。

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漢學界，面對中國和世界文化變遷的局面，受到很大的壓力和挑戰。這些壓力和挑戰，大體上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理論和辯論的挑

戰。海外漢學家置身於這場辯論的文化環境之中，因此面臨的是來自內部的挑戰：作為西方學術界長期以來的「邊緣學科」(與現代漢語語境中所指的領學術風騷的前沿性學科的意義正相反，這裏指的是不入主流、位於末梢和邊際的真正的「邊緣」(margin))，漢學界如何回應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和對多元文化的呼喚？二是西方漢學的學術傳統和模式求變的需求。漢學研究作為西方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一支，一向由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所支配。而文學研究領域裏，則一直由古典文學研究所壟斷。在這樣的情形下，現代文學研究蹣跚起步，步履艱難。這種局面如何突破？如何改變？第三是中國近年的發展。中國當代文學十餘年來的變化觸目驚心，對海外漢學界衝擊很大。多年來形成的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成見被「證偽」。長期以來，西方漢學家不屑於或不便於和中國大陸的學術同行進行平等的對話與交流。而80年代中國的繼50、60年代美學辯論的美學熱、「主體性」辯論、「方法論」熱等

等，拓展了文學研究的「思維空間」（劉再復語），產生了一批富有創見和洞察力中青年批評家^①。如果說，對於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含德國古典哲學與美學、俄國及蘇聯文藝理論、毛澤東延安《講話》以及魯迅、瞿秋白、胡風等左翼文藝思潮等複雜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西方漢學家出於意識形態的成見和學術的隔膜而基本否定或不屑於顧，那麼，對於高揚「人道主義」、「人性」、「主體論」並以批判官式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特徵的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又該如何對待？

後現代主義的文化辯論鋒芒所向，正針對着包括學術研究自身的「話語」模式(discourse)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內涵^②。歷史的自省和反思與社會干預相輔相成，要求有一種高度的學術自覺。大致上，80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正是以這種學術自覺為標誌。這點與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化辯論形成了有趣的呼應與映照。

然而，西方漢學界裏，近年來幾乎聽不見這種學術自覺和反思的呼聲，以及各種學術觀點的正面交鋒，這是頗具諷刺性的。筆者有鑒於此，就西方及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的幾種學術傾向、話語模式以及歷史背景作了扼要分析，並提出該學科在西方的轉型時期遇到的問題和挑戰。筆者英文論文發表於美國《近代中國》雜誌1993年第一期(*Modern China*, vol. 19, no. 1, Jan. 1993)^③。在同期雜誌上還發表了普林斯頓大學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杜邁可(Michael Duke)教授和加州大學河邊分校張隆溪教授的論文，對拙文提出的論點和問題及其他有關問題作出各自不同的批評、論述，作為

一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意識形態與理論：中國學的典範問題論壇」。本文擬對中文讀者簡要介紹一下筆者對西方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評述，同時對三位學者的批評作一回應。

政治社會學式批評的困境

西方漢學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起於冷戰時期對中國現代政治與社會了解的需要^④。從事研究的，大部分是歷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家。他們很少受過文學批評和理論的專業訓練，文學作品在他們眼中亦主要是觀察中國歷史與現實政治的文獻。由於學術研究的強烈現實政治性，以及中國現代文學本身與政治和社會的密切關係這兩重原因，學科一開始就具有濃厚的冷戰意識形態色彩。在另一方面，蘇聯東歐國家的漢學界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亦十分「突出政治」。以捷克學者普實克為代表的「捷克學派」，雖較重視文學自身的規律，但判斷文學作品與文學史的主要標準，仍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1961年，美國華裔學者夏志清與普實克就中國現代文學史展開過一場激烈的爭論。雙方相互指責對方的政治偏見，強調各自的「科學態度」和「客觀立場」。但他們爭論的實質，仍在於各自對中國現代文學左翼主流、左翼和非左翼作家的政治觀點的分歧^⑤。由此看來，西方漢學長期以來以政治意識形態為主導的現代文學研究，與中國49年後至80年代初的情況別無軒輊，差別只是相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立場而已。

不過，強烈的政治意識性正是西方漢學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再指責。長期以來，一提起現代文學，西

西方漢學許多專著不厭其煩地討論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政治社會背景和政治含義，卻不去細讀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的「本文」，進而詮釋其「本文」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的多重意義。



早年西方漢學界多把中國現代文學與社會政治運動掛鉤，往往無法掌握研究對象的實相。

方漢學界馬上就將其與中國的社會政治運動掛鉤，認為文學作品不過是社會政治運動的傳聲筒，是意識形態的工具，缺少內在的藝術價值，因此不值得當成文學來欣賞和研究。這在西方是一種佔支配性的觀點。這種觀點的事實依據基本正確，對社會問題的強烈關懷正是中國現代文學根本特徵之一。然而，因現代文學的政治社會性從而否定其藝術價值，背後卻是一種政治／審美二元對立的邏輯。來自香港的學者周蕾更從中看到一種「東方(包括中國)只有現實政治，西方才有審美和想像」的根深蒂固的偏見^⑥。

實際上，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政治意識性的指責往往起到一種自我辯護的作用。倘若現代文學作品基本上只具有政治學、社會學文獻的價值，那麼政治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了。在學術研究上，西方學者一再批評中國學術界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和偏見」以及「政治凌駕一切」的意識形態立場。同時，他們反覆強調他們自己的公正、中立、客觀的科學態度，以此與研究的對象和中國的同行形成對照。至於公正、客觀、中

立的科學態度背後是否也是同樣有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色彩，對此西方學者們一般都閉口不談。西方文化界學術界裏轟轟烈烈的後現代主義文化辯論和理論之爭，在漢學界自成一體的小圈圈裏總是掀不起波瀾，學術的自省和反思總是形不成氣候，原因恐怕亦在此。

只要仔細閱讀一下近十餘年來在西方出版的在漢學出版史上為數眾多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譯介和專著，便會產生如下疑問：許多專著不厭其煩地討論政治社會背景和作品的政治含義，但有多少部分是通過對作品的語言、結構和形式的分析得出的洞見？這些譯著的選題和範圍，為甚麼都集中在一些引起過政治效應，而中國作家、評論界公認為文學價值不高的作品，如《苦戀》、《人啊！人！》等等？為甚麼這些研究文學的專著，卻津津樂道於作家或作品的「不同政見」勇氣，和政治上與官方相對抗的立場？不少專著和論文不去細讀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的「本文」，進而詮釋其「本文」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的多重意義，而往往是「主題先行」，從

幾條不言自明的思維和話語的習慣出發，斷定凡是左翼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和批評都是為推進黨的路線和政策服務的，因此藝術上必定是粗糙低劣的，根本不能當藝術作品來看待的。

當愛德華·賽義德對西方阿拉伯學的「東方主義」偏見的批評被引伸到漢學領域的時候，學者們紛紛出來聲明在漢學界裏的「東方主義偏見」不是子虛烏有，就是早已壽終正寢^⑦。請看：漢學正宗的古典文學界，一向強調中國古典文化的輝煌獨特，以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和差異性和文化相對主義的衛道士自居。至於現代文學研究，以西方普遍人性論的原則來代替文化相對主義則是合乎歷史事實，順理成章，完全是基於中國的現實生活經驗。可是這種基於中國經驗的、以西方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學政治學觀點，卻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造成了學理和邏輯的兩難。這裏，正蘊含着西方漢學的一個致命傷：一方面，西方學者不斷強調中國現代文學的政治意義大於審美價值；另一方面，他們卻又堅持以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先的方法來研究現代文學。如此在價值上貶低自己學術研究的對象，在方法上游移不定，以「外在」的政治學、社會學方法來研究「內在」的文學作品，豈不犯了一向最講嚴謹、規範的西方學術界的忌諱？

「新批評」文學史觀的二律背反

西方漢學界對於文學研究領域裏社會學政治學佔統治地位的現象是深有所察的。1961年，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了。這

部著作的出版打破了政治社會學的壟斷，首次從文學的內部規律、對文學作品的內在分析的角度，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學術界的合法地位。

儘管西方不少學者指責夏志清的著作充滿反共意識形態偏見和以政治立場判斷作品優劣，但夏著實際上是強調藝術標準第一的，其批評眼光、趣味和模式基本脫胎於英美新批評派和李維斯文學史觀。大致上，夏著是一種標榜藝術至上的形式主義批評，同時亦十分重視文學作品的道德倫理性。這種藝術至上、反對現代化的現代主義觀點基本上主導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但以現代主義的審美趣味和藝術觀來看中國新文學史，難免以偏概全，並且導致了一系列的事實與邏輯上的二律背反。首先，夏著以作品的象徵主義想像力和張力為藝術標準，大力推崇了幾位游離於左翼文學主流之外的「經典作家」，他們的共同特徵是文學語言的象徵性和豐富的詩的意象、反諷的張力和有機的語言結構。張愛玲受到激賞，是因為她的「文學意象之豐富，任何中國現代作家難以望其項背」^⑧。沈從文具有英國浪漫派詩人濟慈和柯勒律支推崇的「否定的想像力」，用文學經營了一片田園牧歌、異鄉情調的意境，使他成為「中國現代文學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⑨。而錢鍾書，則因為他的「優雅的文學中充滿了對細節的經心刻劃和精雕細鑿的意象」，而以一位「偉大的象徵主義者」身分躋身於現代世界級作家之林^⑩。而大部分左翼文學作品均受到夏著批評指責，認為這些作品充滿左翼政治意識形態說教而缺乏藝術的象徵性和意象性。然而，中國現

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是左翼文學，主要形式是現實主義，但夏志清的新批評眼光和歐美現代主義的審美趣味卻妨礙了對左翼文學思潮和現實主義語言形式的深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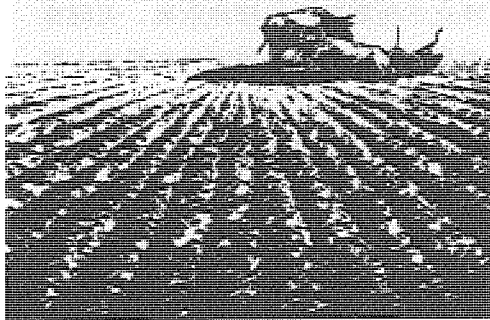
代文學的主流是左翼文學，主要形式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形式與中國的文學傳統、社會現實、意識形態之間，有極其繁複和豐富多彩的衝突、撞擊和矛盾。但夏著的新批評眼光和歐美現代主義的審美趣味卻妨礙了對左翼文學思潮和現實主義語言形式的深入分析。

其次，夏著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問題的看法亦是對文化史和思想史的一種誤讀。夏志清有一個著名的論點，即中國現代作家的「感時憂國」精神妨礙他們達到道德和藝術的超越，而具有真正的「現代性」。他專門引用現代主義批評家屈林(Lionel Trilling)為「現代性」、「現代意識」下的定義：「現代(西方)文學的特色是對文明自身所抱的沉痛仇視態度。」夏隨即指出，「現代的中國文學既隱含對民主政制和科學的嚮往，故就屈林的釋意，與現代西方文學並無相似的地方。」^①這裏夏志清關於「現代性」的看法，顯然是以西方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反對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傾向為出發點的。問題在於中國現代文學有其不同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現代性」，正如中國現代文化與思想史有其不同於西方的「現代性」(modernity)一樣。以所謂的「現代與傳統的衝突」的話語典範來解釋中國近現代文化問題，是很難對中國的問題做歷史和整體的把握的。至於夏志清指責中國現代作家太過於關懷中國的民族存亡而缺少宗教的原罪感和懺悔意識，更是一種不僅與中國而且與西方文化的複雜歷史發展不甚相符的片面之見^②。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夏志清的學術觀點在西方漢學界逐漸形成和產生影響的歷史過程和背景，也許有助於了

中國現代小說史

夏志清原著
劉紹銘等譯



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解其「典範性」。夏著產生於60年代初，正是歐美現代主義文藝紛紛步入學院和博物館堂奧，由離經叛道的牛鬼蛇神搖身一變為文壇新貴的時刻。現代主義作品成為經典，在西方文化商品市場上奇貨可居。大學講堂和學術界裏新批評派作為現代主義文藝的吹鼓手，成為學術界執牛耳者。此時西方正是冷戰意識形態佔絕對上風的時代。新批評派文藝觀並不與冷戰意識形態相對立，時而還相互呼應。夏著相當巧妙地結合了新批評派的現代主義審美趣味和反共的意識形態觀念，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取得了合法性。夏著打破了社會學政治學根本忽略文學「本文」的陋習，開創了細讀「本文」的風氣。不過夏志清的「本文分析」卻又忽略了「本文」背後錯綜複雜的歷史和社會語境。這種歷史的局限，要到70年代和80年代才十分突出。

由歷史主義 向文化批評的轉折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主義方

夏志清援用新批評的方法來解讀中國現代文學雖引來不少指責，但在西方漢學界所造成的影響卻不容抹煞。

法在西方以普實克為代表。普實克重視左翼文學主流和現實主義文學的流變，在西方漢學界產生過相當的影響。

受到普實克、費正清和史華慈等歷史主義觀點的影響和啟發，美國華裔學者李歐梵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作家群做了宏觀的歷史研究，於1973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專著《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李歐梵的著作力圖把握五四新文學浪漫主義流派所表現出的「時代精神」即浪漫主義思潮，對郭沫若、郁達夫等中國著名作家的作品、傳論和歷史事件做了縝密分析。他的專著從歷史的宏觀發展角度對文學現象進行概括，強調文學與時代風貌和精神發展的不可分割關係。李歐梵的研究方法與實證主義的社會學政治學觀點和藝術至上的新批評觀點不同，代表着西方漢學界一種歷史主義的典範^⑬。

70年代後期，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論著在質與量兩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別到了80年代，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從比較和文化批評的理論角度來研究文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和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學術界的廣泛影響，亦開始反映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中。歷史主義的研究角度日益受到重視，但同時也面臨着後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本文分析」的挑戰。李歐梵的歷史主義解讀法，顯然有文學內在分析或「本文分析」的欠缺。更深一層的問題是，他所依據的歷史主義的基本分析框架，以及關於「時代精神」的歷史主義的一整套話語模式，也需要經過歷史的推敲甚至「解構」：關於五四「浪漫主義一代」的提法，是否跨出了「現代與傳統之爭」、「西方影響中國回

應」等基本框架？

在批判歐洲中心論和推進多元文化論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情形之下，西方漢學界開始出現新的力量，重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左翼主流和現實主義再現形式和語言作歷史語境和社會本文的整體分析與批評。1990年，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青年漢學家和比較文學家安德森(Marston Anderson)的著作《現實主義的局限——中國革命時代的小說》^⑭。安德森從「文化批判」的角度，分析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論、批評、創作，細讀中國新文學現實主義形式的奠基者魯迅、葉紹鈞、茅盾、張天翼等的作品。安著的主要特點是把現實主義的語言和形式與其在中國特定社會歷史環境中的嬗變，放在中國現代文化轉型期的大範圍中作宏觀把握。他突破了西方漢學界關於現代中國的種種話語框架，力圖從現實主義再現形式所蘊含的從西方到中國的豐富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的內涵來把握現代中國文學左翼主流的內在動力。安德森的立論、分析和觀點，接近李澤厚關於中國現代文化「啟蒙與救亡」的關係的論點，也與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等關於世界文學大格局中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構想相近。

來自台灣的王德威、來自香港的周蕾等青年學者，以及李歐梵、Ted Hutters 等著名的漢學家，近年來也從現實主義形式與中國現實和傳統文化、女性的話語再現與通俗文化，以及魯迅等經典作家的複雜的民族、道德、政治意識形態和審美意識等多重話語結構等不同角度，重讀現代文學^⑮。來自中國大陸研究比較文學的一批青年學者，包括唐小兵、劉禾、張英進、呂彤鄰、陳小眉以及筆者

李歐梵最近十分尖銳地指出，當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革命文學」的空白，表現了某種「奇特的記憶失落」或「歷史的忘卻」。但這種「忘卻」、空白以至全盤否定，乃是一種「政治無意識」的反映，實質上仍然是一個以政治標準判斷文學作品的問題。

等，近年來以中國現代文學為重點，開始與中國文學批評和文化思想界、西方漢學界和西方當代文化理論界學術界進行多層次、多方位的對話、交流和溝通。這種溝通的目的，旨在把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研究引入世界的文化與社會變遷的現實世界中，引入關於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文化大辯論中，以重新確定我們的立場，開拓新的文化疆域(re-territorialization)。

與林、杜、張教授 對話和幾點思考

《近代中國》上筆者的論文受到林、杜兩位美國漢學家和同筆者一樣來自中國大陸的張隆溪教授的批評，也為我們的對話提供了一個機會。三位學者提出的許多問題，正是筆者和其他同行常常感到困惑和時時思索的。杜邁可的文章提供了大量豐富的史料和論據，並對筆者的論點逐句逐條作了深入縝密的分析批評，體現了上輩學者對學術研究的認真執着與對青年學者的關懷，尤其令我感動。但限於篇幅，本文僅就三位學者的批評中共同關心的幾個問題提出意見，與之商榷。

首先是研究對象，即如何認識左翼文學和革命文學的歷史意義的問題。五四新文學基本上是一個左翼現實主義文學傳統，49年以後的文學是受蘇聯文學和毛的《講話》影響很深的革命文學傳統。筆者認為，西方學者無論是從政治學、社會學角度還是從「新批評」的形式主義角度出發，對認識這個左翼文學和革命文學傳統都有各自的偏差與盲點。大陸學者王曉明、陳思和等針對中共官方的現代文

學史提出「重寫文學史」的問題，筆者認為在西方漢學是也同樣需要文學史與批評的自省。安德森的著作即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但杜邁可堅持認為西方漢學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認識是正確的，夏志清的文學史是「非常令人滿意的」，並重申左翼文學與批評的貧瘠^⑥。張隆溪則義憤填膺地指責中國現代文學都是「為推進黨的路線和政策」而製造出來的「極枯燥無味的宣傳品」^⑦。張文對現代文學斷代史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1949年之前的文學創作於中共掌權以前的年代，如何可籠統地歸結為「推進黨的路線和政策」的宣傳品？即使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文學，是否因為是在中共掌權後創作的，就都像張文認為的那樣，令人厭惡，不忍卒讀？李歐梵最近十分尖銳地指出，當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革命文學」這塊空白，表現了某種「奇特的記憶失落」或「歷史的忘卻」^⑧。筆者認為，這種「忘卻」、空白以至全盤否定，乃是一種「政治無意識」的反映，實質上仍然是一個以政治標準判斷文學作品的問題。這恰好是筆者要提出來請大家共同反省、思索的。

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問題的另一面。張隆溪認為，美國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與筆者是運用「第一世界理論」來描述「第三世界經驗」，筆者提出理論的自省和政治意識形態性問題，是「把西方當代理論及其政治詞藻視為文學和文化研究中的絕對價值標準」^⑨。張文則反複強調他所謂的「第三世界經驗」與「西方理論」的根本差異性、邊緣性，提倡用「經驗」來「檢驗理論」(不知道這是否是「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論斷的翻版?)^⑩。然而，張

張隆溪義憤填膺地指責中國現代文學都是「為推進黨的路線和政策」而製造出來的「極枯燥無味的宣傳品」。對現代文學斷代史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

的「第三世界經驗」真能反駁筆者關於理論的自省、批評以及「經驗」的政治性的「第一世界的理論偏見」嗎？張文在描寫他的經驗時是毫不閃爍其詞的：他閱讀中共「極權主義政治指揮」下創作的作品的經驗是「令人生厭……沉悶的」^①。不過，張用來形容他的「第三世界經驗」的理論本身，又是地地道道「第一世界」的。他分析研究中國文學（主要是古典文學）的西方理論框架主要來自於伽達默的解釋學。在反駁筆者時，張文特為引用了伽達默的話來論證「經驗」的重要。但是伽達默的解釋學有一個重要的論點，即是一切理解和經驗都不可避免和無法脫離其歷史的「偏見」^②。「偏見」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自己的偏見熟視無睹，或當成一種財富來四處炫耀。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關係。張隆溪的論文溶入了後結構主義反整體論和經驗論觀點，相當繁複巧妙地否認了馬克思主義（包括詹明信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研究，並且思考中國問題的價值。林培瑞則直截了當地認為新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問題毫無幫助，毫無前途^③。然而我們是否因為中國和西方社會的文化歷史差異，就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意義？我們是否因為中共官式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和研究中造成的後果，就一筆抹煞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文化觀在中國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潮和左翼文學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傳統，對於這個非常重要的傳統，我們要不要從其內部的發展演變，內在的矛盾、衝突來研究？要不要從馬克思主義的

文化思潮在世界各地區、各民族的歷史發展的宏觀角度，來重新認識從瞿秋白、魯迅到胡風、從周揚到王若水、從朱光潛到李澤厚、劉再復，這條極為豐富、複雜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和美學理論的傳統？中國80年代的文化反思運動中，各種學說、思潮、流派蜂擁。不過，影響最大、對官方意識形態造成威脅和挑戰最強烈的，還是李澤厚、劉再復、金觀濤等的思想理論。他們的理論基於中國的經驗，高揚人的主體，力圖通過文化批判和文化啟蒙，來達到文化重建的目標，既有深沉的歷史感，又有放眼人類命運的宏大胸襟。可以說，李澤厚等在80年代，基本上形成了一種中國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對他們的思想的研究才剛剛開始。筆者願與一切對此有興趣的同仁一起在這一領域內作更深入的研究^④。

最後，筆者認為，在當前文化多元、開放的呼聲高漲的情形下，我們仍然面臨着確定我們自己的立場和位置，認清我們學術研究中的「文化和政治的隸屬和參預」的問題^⑤。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政治與文化格局中，某種新的冷戰意識正在抬頭。在中國問題的研究與討論中，我們對此更應該有清醒的認識。甘陽在回顧80年代的文化反思時指出，我們不得不採取一種既對傳統社會批判、又對現代社會審視的「兩面作戰」的態度。筆者的「隸屬和參預」，也有相近的意思^⑥。

註釋

① 除了劉再復等中年學者，活躍於80年代的中國批評和學術界的青年學者有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王曉明、陳思和等。李陀、程德培、吳亮等則形成了「學院」之外的以實驗小

中國80年代的文化反思運動中，影響最大、對官方意識形態造成威脅和挑戰最強烈的，還是李澤厚、劉再復、金觀濤等的思想理論。他們的理論基於中國的經驗，高揚人的主體，力圖通過文化批判和文化啟蒙，來達到文化重建的目標。

說為主要對象的批評家群。

② Steven Connor: *Postmodernist Culture* (Oxford, 1989); Linda Hutcheon: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New York, 1989).

③ 筆者論文題為“Politics, Critical Paradigms: Ref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其他論文為Perry Link: “Ideology and Theory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Michael Duke: “Thoughts on Politics and Critical Paradigm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張隆溪: “Out of the Culture Ghetto: Theory, Poli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張文的中文譯文發表於《今天》1992年4期。張隆溪在將他的論文譯成中文時更改了題目，從原文的「走出文化的貧民窟」改為「走出文化的封閉圈」。這是一個值得稱讚的改動。原文將中國文化或中國文化／文學研究稱為「貧民窟」(ghetto)，張大概亦覺得不妥。本文引用的張文均以《今天》的中文本為準。其他人引文均見 *Modern China* (Jan. 1993)。

④ 林培瑞在他的論文中指出，早期的現代中國研究由福特基金會和美國政府的國防外語預算中撥款支持，用來「了解敵人」，知己知彼。見註③，Perry Link, p. 4。

⑤ 夏與普的爭論文章均收錄於Jaroslav Průšek (Leo Ou-fan Lee ed.):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Bloomington, IN, 1980)。

⑥ Rey Chow: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Minneapolis, 1991), p. xiii.

⑦ 見註③，Michael Duke, p. 55。賽義德對「東方主義」的批判見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1978)。

⑧ ⑨ ⑩ ⑪ 分別見 C.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pp. 393-96; 207-8; 459; 536。

⑫ 關於西方非宗教世俗文化在現代西方社會形成中的作用，見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1971), p. 171。

⑬ 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1973)。

⑭ Marston Anders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 1990)。

⑮ David D. Wang: *Fictional Realism in 20th 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New York, 1992); 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 1987); Ted Huters ed.: *Reading the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y* (Armonk, NY, 1990)。周蕾的著作見註⑥。

⑯ 見註③，Michael Duke, p. 47。

⑰ 見註③，張隆溪，頁219。

⑱ Leo Ou-fan Lee: *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Liu Kang and Tang Xiao bing ed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⑲ ⑳ ㉑ 分別見註③，張隆溪，頁217；頁218；頁219。

㉒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1986), p. 238。

㉓ 註③，Perry Link, p. 9。

㉔ 筆者目前正在研究現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潮與美學理論的問題。參見 Liu Kang: “Subjectivity, Marxism, and Cultural Theory in China”, *Social Text* (31/32, 1992)，及劉康：〈主體性論爭之淺析〉，《知識分子》，92年夏季號。

㉕ 註③，Liu Kang, p. 38。

㉖ 甘陽主編：《中國當代文化意識》前言(香港三聯，1989)，頁iii。

劉康 1982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外文系。1989年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教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著有“Subjectivity, Marxism, and Cultural Theory in China”(*Social Text*, 31/32) 等論文。